



安康学院
ANKANG UNIVERSITY

教 学 简 报

(教育研究专刊)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147 期)

教务处编印

2023 年 6 月

目 录

【高等教育】

深化产教融合：理论依据、实践基础与实现机制	1
政校企协同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路径重构	9
高等教育系统论视域下的产教融合“组合拳”——江苏实践与思考	19

【基础教育】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	26
家校携手 护航童年	27
学校开展好家庭教育指导的五个着力点	29
“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问题、取向及优化策略	33

深化产教融合：理论依据、实践基础与实现机制

江春华

摘要：产教融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共识，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规律。产教融合是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互联互通、紧密协作的融合发展过程，是社会各领域要素相互渗透、交叉、协同基础上的异质性、互补性融合。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在社会大融合环境、产业融合、科教融合等广泛社会实践基础影响下，深化产教融合需要通过实施组织治理、协同创新、合作联盟等机制，才能有效推进产教融合纵深发展，服务于创新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产教融合；理论依据；社会实践基础；实现机制

产教融合作为国家政策话语最早见于 2013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行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模式”，普通本科院校也要建立产教融合办学模式。此外，《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可以看出，产教融合已经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双一流”建设的共同举措和突破窗口。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明确指出：“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全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产教融合出台的国家政策文件，涵盖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以全局性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扩展了产教融合的应用范围，丰富了产教融合的深刻内涵，提升了产教融合的重大意义。2019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改社会〔2019〕1558 号），再次强调了“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产教融合在国家战略、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仅 2018 年，安徽、河北、山西、江苏、辽宁、甘肃、云南、西藏、河南、广东、天津、新疆、四川、青海、重庆、浙江、内蒙古、福建、吉林、海南、广西、湖南等二十余省市就相继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和方案，聚焦推动产教融合全面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

一、产教融合的概念内涵与理论依据

（一）产教融合的概念内涵

产教融合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演化，依据时代变革要求和教育发展需要，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道路上逐渐成为今天的共识。仅仅从概念表述上来看，“产教结合”、“产学合作”、“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产教融合”等等，实际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教育界和产业界之间互动、合作、创新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追求。李玉珠认为产教融合的内涵经历了从人才培养模式、产教合作关系到教育与生产交叉的制度三个阶段，现已成为一种制度创新。陈志杰依然认为产教融合是一种“产业”和“教育”、“企业”和“学校”、“生产”和“教学”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刘志敏强调产教融合是一个从融入、融通再到融合的逐步演化和持续递进的发展过程，彰显着融合水平的不断提升。欧阳河、戴春桃则指出产教融合即产业与教育融为一体，其基本标志是产生新的产教融合体或增长点。笔者认为，产教融合是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互联互通、紧密协作的融合发展过程，是社会各领域要素相互渗透、交叉、协同基础上的异质性、互补性融合，既是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式，也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大学、产业、政府等核心利益相关主体都要明确自身定位，都承担着相应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而且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并不是各行其道，所以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形成强大合力，促进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充分发挥联动协同作用。在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融合创新日益成为大学的一种新功能，是传统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三重融合于一体的新功能。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消亡了，而是融合于一体，通过实施产教融合、科教融合而发挥整体性作用，改变原有的孤立、分裂状态，使得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环环相扣，相互体现，发挥融合创新功能，产生 $1+1+1>3$ 的融合效应。产教融合是推动大学变革、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和有效方式，任何类型、任何发展水平的大学都要主动适应、全面实施、准确引领产教融合。

（二）产教融合的理论依据

1.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产教融合中的教育主体实际上涵盖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各个领域，已经扩展为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教育系统。教育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内外相通、相互影响的。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资深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即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

个社会系统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简称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具体内涵就是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教育既要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所制约，又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需要所服务。产教融合是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但又不局限于这两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科技、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也是深度参与其中，而且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地、被动地参与和发挥作用。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深深蕴含于产教融合过程之中。另一条教育基本规律是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即教育系统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称之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产教融合既生发又作用于教育系统，最根本的依然是为人才培养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潘懋元教授还特别指出这两条内外部关系规律指向的是整个教育，而非单指高等教育；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位的。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产教融合是教育系统改革创新的内生性具体实践方式，同样也是联结教育内部发展需要和外部环境要求的有效组织模式。产教融合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内在需要和有效途径，是符合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

2.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产教融合的核心主体之一就是大学。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亨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教授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劳埃德·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教授共同开创了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创新模型（Tri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l），主要研究知识经济时代，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大学、产业、政府三个核心主体之间密切合作、协同创新的新型关系。这恰好为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的理论支撑。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在知识社会中，大学在创新系统里将扮演着一个更加突出的角色，它的作用与产业、政府不相上下，甚至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二是大学、产业、政府三个组织主体会进一步建立并提升协同合作关系，创新政策不再由政府单方面制定，而是各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三是每个组织主体在完成自己传统功能的同时，也能够承担起另外两个主体的角色。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的发展实际上也有四项维度：第一维度是每一个螺旋内部发生的变革；第二维度是一种螺旋对另一种螺旋产生的影响；第三维度是三螺旋中三维网络与组织主体相互作用所新覆盖的创造物；第四维度是新组织实体产生的递归效应，从最初的形成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的交互融合。总而言之，大学、产业、政府在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发挥传统功能作用的同时，又都能成为产教融合过程中的行动者、组织者、促进者，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有活力的、非线性

的交互式创新模式，从而和谐地共生演化，促进价值共创，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可以说，产教融合正是运用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密切合作、优势互补，有助于实现资源集聚与高效利用，人才集聚与创新创业，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二、产教融合的社会实践基础

（一）社会大融合的环境孕育产教融合

紧密联系、深入合作已经成为一体化世界的普遍特征。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持续变革、不断融合的有机整体，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系统都置身其中，都在经历着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融合创新，也都是一系列社会变革而产生连锁反应的生命过程的主体。可以说，社会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宽领域、深层次的持久过程，是社会大变革、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作为人才培养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是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重要子系统。而传统的教育系统、产业系统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壁垒相对严重，受制于外界的冲击而只能发挥有限作用，也没有紧密围绕人才培养这个纽带，逐渐脱离社会大融合的环境。随着知识经济蓬勃发展，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信息、技术、知识、人员等基本资源要素流动性越来越强，单独应对社会变革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产教融合面临重大机遇和迫切要求。产教融合是社会大融合环境的应然产物，是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但又不局限于这两个子系统，政治、科技、文化等其他子系统也是深度参与其中，而且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地、单向地相互作用。不同系统之间需要在变化中快速融合，与社会变革同频共振；还要在融合中体现变化，通过动态的融合发生质变，促成系统升级。

（二）产业融合的跨界聚合催生产教融合

社会大融合的突出表现就是产业融合，知识经济也是以产业融合为竞争重心的。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交叉联结，逐步融为一体，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的动态演化过程。它通过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产业外部的延伸融合以及全新产业的取代融合，以市场需求、知识扩散、科技渗透、服务创新四条主线形成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扩大市场容量，培育新的价值增长点，建立新型的非线性竞争协同关系，促进产业系统的转型升级。产业融合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使得不同产业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带来产业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以及改变传统的市场结构，由此促进传统产业组织形态的变革和孕育大量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纵观全球经济领域，各行各业向知识产业转变，产品生产型企业向知识生产型企业转型，知识工人创造更大的生产价值，经济

法则由知识法则所取代，知识价值决定产品价值。因此，伴随着新业态的出现、新市场的开辟、新技术的应用、新产品与新服务的诞生等等新变化，产业融合不再局限于产业系统自身，而是不断延长融合半径，建立更加广阔的融合圈。产教融合就是产业融合进行跨界聚合的结果，通过横向融合，共同集聚社会内外部资源要素和人力资本，扩大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和竞争性协同创新效应，成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有效方式。

（三）科教融合进入产业领域加速产教融合

科学研究为产业融合过程中解决重大基础性和前沿性课题提供强大的动力保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 世纪以来，大科学发展和高新技术变革逐渐持续叠加，产生融合效应。从科学研究本身来看，不同研究领域从界限不明到逐渐分离，再到如今的相互渗透、融合，也是经历了一个分化与融合交织发展的过程。1921 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欧内斯特·尼克尔斯（Ernest Nichols）提出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纯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研究目标和研究动机上。1945 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主任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认为科学研究可以分为“纯科学研究”、“背景研究”和“应用研究与发展”三种类型。这是一种基于知识单向流动的线性研发模型，也被称为“布什范式”。1958 年，斯坦福大学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建议使用“学问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范式。特曼教授不仅重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而且将二者的差别最小化。20 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 D. E. 斯托克斯（D. E. Stokes）依据科学研究的学术属性和应用属性建构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型，将应用为目的引发的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

（Pasteur's Quadrant），但这实质上属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的象限。斯托克斯教授对布什线性模型提出了极大挑战，建立的是一种非线性研发模型，更好反映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彼此互动、相互支撑的内在关系，实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刘则渊、陈悦则建立了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分别作为纵横坐标的科技象限模型，从而将科研象限模型中的巴斯德象限变换为科技象限模型的新巴斯德象限（New Pasteur's Quadrant），即技术科学象限，进一步认识了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既要“强化基础研究”，也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就要求科学研究领域也要加大融合创新，实施科教融合、产科教融合。事实上，科教融合本质上也是产教融合的一方面，通过科教融合，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与应用，进入产业领域，实现产教融合，提升社会创新效能和生产力水平。

三、产教融合的实现机制

（一）组织治理机制

产教融合涉及面之广、合作程度之深、实施力度之大、效果之显著，都是以往不曾达到过的。这自然是众多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其中，高水平大学、龙头企业是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的内部重要主体，也是产教融合的核心促进者。政府则是产教融合外部的有力促进者，其角色主要体现为产教融合有利环境的创造者、优质服务的供给者和发展过程的监督者。作为异质性组织的三方主体，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治理机制，使其在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发挥独特作用的同时，又能扬长避短、相互协调、密切合作，构建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创新模型，以灵活多样的合作框架来引导知识融合和组织创新，是实施产教融合的一大考验。首先，组织治理不能是单维度的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兼顾各类组织的性质属性、社会职能、资源禀赋和利益诉求，以求达到组织治理的起始平衡。其次，组织主体之间要逐步消除组织壁垒，打破组织围墙，淡化组织界面，加速人员、活动、要素的渗透与融合，通过科学规划和流程再造加强各组织的协调管理，避免出现组织冲突甚至组织对抗。再次，各类组织要充分整合利用区域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通过对各种资源进行识别与归类、获取配置与消化吸收，使其更具有系统性、层次性、高度适用性、高价值性和收益递增性，最终取得优化配置资源、高效使用和创造资源的整体最优效果。最后，要充分发挥自组织功能，增强组织主体自我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通过共同进化、相互学习、紧密协作而自我繁衍、自我增值，激发组织创新的动力与活力，提升组织运作绩效，促使组织向有序化、协同化方向迭代升级。

（二）协同创新机制

协同创新是知识生产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市场中介机构、创新平台 and 用户组织等，为了科学研究和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大跨度有机整合的组织管理创新机制。它是不同组织“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价值共创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低级有序迈向高级有序的自组织过程，其实质是知识协同。协同创新机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协同创新中心的搭建与运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协同创新中心或实施计划已经较为成熟，例如美国的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s, I-UCRCs）、欧盟“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科研创新框架计划、日本“世界顶级研究基地形成促进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 WPI）、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内的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 计划”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总体

要求，目前已认定两批共 38 个“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分为科学前沿类（8 个）、文化传承创新类（7 个）、行业产业类（15 个）和区域发展类（8 个）四大类。各省市、高校也相继成立、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此外，我国已经认定建设多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这些协同创新机构实质上都是一个个“知识场”，既是存储容纳知识的物理场所，也是创造分享知识的开放平台。协同创新机制就是要充分释放人才、知识、资本、市场、政策等方面的活力，强化跨境、跨区域、跨行业、跨组织、跨学科的战略合作，构建利益相关方全面支持的协同力，着力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协同创新中心不是孤岛，它既要善于集聚异质性、互补性创新资源，又要保持高度开放、兼容并蓄的姿态，建立多元化的组织治理结构和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确立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使命目标、权力范围和责任边界，优化业务布局，加强对话沟通，实施战略导向的绩效评价，为突破前沿基础研究瓶颈和解决重大科技难题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三）合作联盟机制

合作联盟是为了加强组织主体的战略协作和提高整体竞争力，通过整合政府、大学、行业企业等资源力量，以投资参股或签订协议、契约形式结盟建立的“抱团式”合作组织。它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竞合”关系。产教合作联盟机制是产教之间多主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手段，它致力于推动大学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协调合作，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实现多方互利共赢，是推进产教融合的重要组织创新。从知识的角度理解就是知识联盟，是一种全新的知识集约关系，实现知识集成与知识共享，发挥知识优势的显著作用，使联盟各方彼此受益。1948 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全球产业联

(IndustrialLi-aisionProgram, ILP)，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与产业界开展全面合作的行业战略联盟，主要面向具有全球市场领先地位的创新型企业。时至今日，全球产业联盟拥有 200 多家龙头企业会员，其中三分之一会员企业一直为麻省理工学院科研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全球产业联盟仍然是麻省理工学院与全球顶尖企业合作、将大学科研实力最大限度转化为企业生产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宁波市在产教合作联盟建设上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通过加强政府主导的政策环境、行业主导的产业环境、企业主导的市场环境、大学主导的育人环境建设，逐步构建起四方联动的产教合作联盟生态系统。目前，宁波市共组建了 13 个产学研联盟，5 个产教合作集团，覆盖纺织服装、医疗卫生、物流、汽车、创意设计、旅游、电子商务等行业，特别是 2017 年率先成立全国首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和跨境电子商务产教合作联盟，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教合作联盟机制拓展了传统产学研合作的空间，使得供需双方在最大程度上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信息对称和

合作信心，形成强大发展合力，既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也提高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和贡献度。

四、结语

从外围环境来说，社会是一个大融合的联结体，行业产业、科学技术、信息媒体、区域城市都在不断融合创新。外部环境造就了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可能，也造就了更多知识与应用场合需求碰撞的机会。在今天以知识为发展中轴的社会中，作为知识生产源和知识服务器的大学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知识资本化，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它既不是单一的教学组织、科研组织，也不是单纯的“象牙塔”、“服务站”，更多地已经成为一个融合型组织。而传统封闭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落后于社会变革融合的大趋势，与产业升级需求、科技创新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传统的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也彼此分立、割据一方。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性”动态平衡，即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研究创新能力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要求和对新知识需求之间的平衡；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之间环环相扣、相互体现而发挥整体性、融合功能的平衡。产教融合作为建立“生产性”平衡的支点，不能停留在表面或某一方面，已经到了不得不深入推进、全面实施的地步。事实上，产教融合一直存在，只是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产教融合是教育、科技、产业、文化等不同社会分工系统在功能、组织、制度、资源方面的相辅相成和协同对接，是知识融合、技术创新在上游、中游、下游的无缝连接和深度耦合。尽管产教融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发展模式，但其最根本的落脚点仍然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产教融合既是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全社会、各领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深入实施、提高成效。

资料来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 年 2 月第 25 卷第 1 期

☆☆

政校企协同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路径重构

肖荣辉

摘要：产教融合作为我国应用型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既是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也是全面提升教育链与产业链契合度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存在产教融合政策制度体系欠完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缺乏针对性、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供需存矛盾、产教融合企业主体作用不明显、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建设较薄弱等现实困境，导致应用型高校与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结构性矛盾。要为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高素质人才，深化产教融合、明晰产教关系是关键所在，必须对产教融合参与主体权、责、利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完善产教融合保障机制；健全合作育人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深度开展；深化多方协同共建，推动产教融合互动升级；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打通产教融合发展壁垒；完善产教融合平台，奠定产教融合实践基础。

关键词：政校企协同；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高等教育

随着我国步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也将发生变化，加快推进应用型高校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助力学科专业群和创新平台建设，成为应用型高校提升内涵建设质量和特色发展的重要举措。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标志着产教融合已上升至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层面，成为我国应用型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内涵建设质量提升和解决人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产教融合作为我国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校企整体协同效应。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存在政校企协同不深入、人才培养体系同质化、教育资源零散化等突出问题，阻碍当地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深度推进。而政校企协同规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培养质量监控、推进教师发展评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举措，是产教融合高效实施的主要路径，有助于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及影响因素协同发展。因此，有必要以政府、高校和企业等三大主体为研究对象，理顺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推进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应用协同理论创新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实施路径，积极打造政府高度重视、高校全面投入、企业积极参与的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构建产教融合运行新机制、优化政校企资源配置、

打破产教融合各影响因子之间的藩篱，全面提升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契合度，促进政校企优势资源互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研究文献回顾

我国对于产教融合的实践与研究可追溯到近代的“职业教育”，早在199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发〔1991〕55号）明确提出了“提倡产教结合”的相关概念，并在职业教育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职业教育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标志着职业教育“产教结合”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步进入“产教融合”发展新阶段。随着产教融合模式的逐步成熟和推广应用，有部分应用型高校也展开了积极探索和试点应用，并取得积极成效。在研究过程中，以“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两个关键词并含关系在知网中进行检索，根据检索情况可以看出，从2014年开始，便有学者在“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方面展开了研究。截至2021年11月，知网共收集了相关文献515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文献71篇，且研究成果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基于发表于核心期刊的71篇文献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教融合综合性、产教融合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专业设置、教师队伍建设和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

针对已有研究分析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产教融合现状、困境与对策进行系统性分析。例如，李凤（2020）认为，目前应用型高校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存在共识、共赢、共治之困等问题；黄大乾、饶丽娟（2021）认为，产教融合存在校热企冷现象，制约了产教之间的深度融合。为有效破解产教融合参与主体间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毛才盛、田原（2019）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提出政府、高校、企业应当通过完善动力机制、优化组织模式、创新行为模式、优化产业政策等措施来促进产教融合深度发展；柳友荣、项桂娥、王剑程（2015）认为，参与主体的内部因素、双方耦合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都对产教融合存在一定影响，只有充分发挥高校与企业“双主体”的育人模式，才能确保产教融合有效实施。另外，为确保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部分学者基于产教融合在课程体系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也展开了相应研究。例如，李银丹、李钧敏、施建祥（2020）通过研究发现，应用型高校课程建设存在与办学定位不匹配、设计理念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等问题，应当通过校企共施课程管理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汤正华、周泽民、张兵（2020）认为，目前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供需脱节问题，通过产教融合，实现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要素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破解应用型人才培养供需脱节问题；

金向红（2021）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应用型高校教师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现象，应当通过建立多元融合、实践和应用导向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于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教融合系统性分析上，或是针对某一参与主体、影响因素而展开研究，缺乏对产教融合各影响因素综合性分析。而产教融合的深化及创新应用，并不能因为某一参与主体、影响因素得到优化或自身系统性问题得到解决而得以实施，需要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及影响因素协同优化。因此，对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对于产教融合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二、政校企协同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存在的现实困境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涉及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多个主体的利益博弈，而且需要财政、税收、土地、保险等多方面的组合激励和推动。基于政校企协同推进产教融合创新实施，能够理顺政府、高校、企业等三大主体的功能定位，促进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衔接，实现彼此之间优势资源互补，优化社会公共资源配置，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中政府、高校、企业各自为政的壁垒，对于政府、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发挥协同效应具有积极作用。当前，我国部分地区产教融合政策制度体系不完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缺乏针对性，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弱相关，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导致教育链与产业链之间出现供需失衡。具体分析如下：

（一）产教融合政策制度体系欠完善

1. 缺乏系统有序的配套制度

虽然国家已经从财政、税收、金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了推进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但并没有出台相应的监督执行和考核评价措施，对于如何支持、资助力度的大小、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风险分担、实施成效等方面缺乏具体的实施意见，缺乏反映产教融合效果的评价体系，容易导致参与主体间在利益分配方面产生分歧和产教融合流于形式，阻碍产教融合深度发展。另外，地方政府层面缺乏对产教融合的具体规划措施，缺乏落实国家有关资金、税收优惠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实施方案，导致应用型高校在开展产教融合过程中缺乏系统性思考和必要的制度关联性支撑，难以有效支撑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

2. 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

虽然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意见,要求加快推进产业需求侧和人才供给侧要素全方位融合,不少地方城市也从财政、科研、知识产权等领域出台相应落实措施,但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和激励措施,导致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难以有效发挥其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地位。比如,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部门没有专门设立关于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工作的扶持基金,用来鼓励支持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深化产教融合。虽然国家层面有下拨经费鼓励支持地方应用型高校开展产教融合工作,但高校所能申请到的扶持资金对于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教师队伍培养等显然得不到满足,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3. 缺乏特色鲜明的创新模式

虽然政府、高校、企业等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形成了政校企、校校企、校企等合作模式,但政校企之间合作缺乏整体框架体系和灵活机制,导致合作基本是以框架协议形式存在,缺乏必要的权利、义务、约束机制等合作育人机制,难以对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支撑,也不利于产教融合适应政策变迁,导致合作过程难以长久持续,合作育人流于形式。根据有关统计显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300余所高校响应国家号召,申请转型应用型高校改革试点,但转型高校中有77.6%的高校认为,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效果不佳,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仍然不高。

(二) 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缺乏针对性

1. 缺乏深入对接机制

在现实的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高校往往更多地是从自身办学角度思考问题,并没有结合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企业的利益诉求和人才需求进行融入对接,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育教学实施等过程中没有融入企业对人才的岗位需求标准,导致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需求呈背离现象,企业难以通过产教融合获得实际人才红利和效益,导致企业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2. 缺乏有效激励机制

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高校普遍缺乏针对教师推进产教融合工作方面的激励,导致教师对于产教融合工作缺乏主动性,特别是在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教师更是无暇关注学生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自然也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和相关岗位的标准化需求。

3. 缺乏规范运行机制

受到我国行政体系的制约，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导致部门之间沟通渠道不通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频出，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的现象。例如，福建省目前已经从发改、工信、科技、财政、人社、教育、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部门出台 30 余项政策和 130 余条措施支持产教融合工作，但财政部门注重资金使用，科技部门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监管部门注重知识产权归属，导致研发经费、成果开发、转化、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方面难以形成协同发展，阻碍产教融合深度推进。

（三）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供需存矛盾

1. 无法实现“零适应期”人才培养

由于大部分应用型高校由高职院校升格或民办本科转设而来，受制于前置身份影响，导致自身应用型的特色和亮点被弱化，学科规划、专业设置仍然沿用传统做法，人才培养与综合型大学同质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缺乏对标市场上的人才需求，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受到教学条件的限制，部分应用型高校的知识结构体系偏重于理论学习和简单的实践操作，课程知识未能有效融入新技能，缺少必要的应用型创新实践，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与职业需求大相径庭，缺乏行业性、专业性、综合性。

2. 学生实习实训与企业需求冲突

受制于应用型高校专业设置特点，即人文社科类专业偏多等问题影响，企业能够提供的实习实训岗位有限，特别是在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企业所能提供的实习实训岗位更难满足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需求。另外，受到学生职业意识淡薄、责任感不强、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存在对学生实习实训排斥现象，导致学生难以通过企业实习实训学习岗位知识和技能，最终导致部分城市出现毕业生就业压力大、难找工作等现象。

（四）产教融合企业主体作用不明显

1. 企业经济效益难以满足

企业普遍关注的是通过产教融合获得高校技术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带来可观的收益，较少关注联合培养学生、教师培训和产教融合基地建设的隐性红利，而应用型高校普遍存在初创型现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满足企业追求的短期经济效益，导致彼此利益冲突，不愿意与高校合作。虽然有部分企业名义上参与了产教融合工作，但主要还是出于提高自身知名度或打造良好社会形象的目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参与产教融合工作。

2. 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动力不足

由于我国以中小企业数量居多，存在创新能力弱、资金不充足、技术力量薄弱、生产条件落后等现实问题，导致对前期投资大、承担风险高且预期收益不明显的产教融合项目存在抵触情形，难以在产教融合中真正发挥引领作用。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在 2021 年 7 月联合认定了 63 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但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在数量以及其他客观条件上难以满足产教融合对企业参与的实际需求。

（五）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建设较薄弱

1. 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力度不足

部分应用型高校因前置发展基础薄弱，导致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数量有限，缺乏专业性的生产性实践教学条件。虽然有部分院校也尝试建设了产业学院或技术创新研究院，但与企业资源对接少，而且实践类课程及教材未能根据岗位能力需求及时更新，无法将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前沿技术和动态知识融入教学，难以满足学生实习实训、实践岗位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的培育需求。

2.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匮乏

部分应用型高校教师仍然存在重教学、轻实践的传统教育理念，教师队伍缺乏实践动手能力，而且新引进教师普遍存在高学历、高职称，学历相对较低的高技术型人才难以参与到教学工作中，导致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匮乏。经过调查发现，江苏省部分应用型高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占比不足 50%，难以满足产教融合开展的实际需求；“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配套机制不完善，在职称评审方面仍然存在重理论科研、轻实践教学现象，缺乏对实践教学、技能竞赛、成果转化的激励性措施。

3. 创新应用能力有待提升

受到高校对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的影响，教师普遍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获奖等级和理论研究水平，而忽视了成果的创新应用情况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导致应用型高校仍然存在创新应用能力和内生动力不足现象，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缺乏创新应用型研究能力和社会服务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根据有关调查统计显示，我国科技成果年均转化率不到 20%，产业化不到 5%，而发达国家技术成果转移率高达 40%—50%。

三、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政校企协同路径

面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政策制度体系欠完善、育人机制缺乏针对性、人才培养供需存在矛盾、企业主体作用不明显、实践平台建设较薄弱等现实障碍，必须突破传统产教融合思维，吸纳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念精髓，通过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健全合作育人机制、深化多方协同共建、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完善产教融合平台等创新举措，

完善产教融合保障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深入开展、推动产教融合互动升级、打通产教融合发展壁垒、奠定产教融合实践基础，最终实现创新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实施路径。

（一）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完善产教融合保障机制

1. 完善产教融合法制保障

建议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出台“产教融合促进条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产教融合培养目标、实施路径、监督体系和评价方式等内容，保障已经出台政策的有效执行。明确政府、高校、企业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确保彼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别是在科技成果产权界定、转化收益等方面加以明确。例如，澳大利亚为推动产教融合顺利实施，出台了《培训保障法》《技能立国—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发展的新理念》等一系列产教融合支持政策，为产教融合持续深入推进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2. 完善产教融合评价体系

建立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组织机构，不断优化产教融合考核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为产教融合组织顺利运营提供咨询、评价与监督服务，确保产教融合与时俱进。加强地方政府对制度落实情况的考核，把经费保障、科技成果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等产教融合推进政策落实情况纳入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不定期组织开展考核评估，及时完善和调整政策措施，提高政策措施的匹配度，助力实现公共资源最优配置。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思路，加强高校对产教融合落实情况的考核，结合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区域服务能力、经费使用情况等构建产教融合综合评价体系，把制度落实、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实践条件、学生就业情况、成果转化、服务企业需求等作为具体评价指标，依据评估结果对高校产教融合工作落实情况给予定量数据诊断和有序督查，并及时对外公布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就业情况、社会反馈情况等报告，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及时排除风险隐患，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二）健全合作育人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深入开展

1. 建立区域校企深入对接机制

应用型高校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导向，应当秉持开放性和跨界性办学思维。建议应用型高校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入对接，主动与地方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及行业机构开展跨界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与企业合作交流，充分发挥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闽西南、胶东半岛等区域联盟优势，将学生实习实训等实践类项目搬到产业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开展，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体制深度合作与优势资源互补。

2. 完善产教融合激励机制

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全主体、全过程、全方位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工作，将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办学资源、教师实践场所、参与产业学院建设等作为行业、企业重要考核内容，并在土地使用与资金支持、税收减免和抵扣等方面给予激励，逐步强化各方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为政府、高校和企业协同参与产教融合工作提供法治化、规范化良好环境。

3. 完善沟通交流机制

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发改、财政、科技、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成立“产教融合工作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指导、监督、评价作用，确保产教融合工作责任到部门，解决彼此间责任不明确、工作不协调等问题。建立完善的工作推进机制，明确产教融合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等具体工作推进机制，采取例会制度有效解决沟通不通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和困难。建立完善年度统计报告制度，加强对产教融合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参与情况等工作的跟踪监管，确保产教融合政策落到实处、发挥最大效用。例如，澳大利亚为确保产教融合支持政策的顺利落实，成立了教育部长委员会（MCVTE）；德国为确保产教融合顺利实施，同样也搭建了一个由高校、行业、企业、工会等共同组建的教育事务决策和协同平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产教融合治理体系。

（三）深化多方协同共建，推动产教融合互动升级

1.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鼓励高校加强特色专业与专业群建设，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参与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设计、论证与实施，确保将产业链需求融入人才培养计划制定、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等环节，实现高校专业教学资源与企业新技术、新标准融合共享，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深度融合。联合企业共同打造与产业高度契合的课程资源，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增强学生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学生就业适应能力。例如，德国政府部门承诺的专业全部源自社会职业，有效确保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高度衔接，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2. 构建多层次立体化课程体系

打破传统单一专业课程设置，全面构建“公共必修课+一级学科课+专业方向课”的多层次立体化课程体系，实现跨专业教学资源共享、资源集成。充分依托产业园与教育园等资源优势，探索“1+X”教育制度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的创新应用，推广学分互认、课证互认、课赛互认等教学模式，试点开展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产业园间教学资源共享，鼓励学生参与

其他高校或产业园专业课程教育、资格认证、竞赛活动、实践活动等 X 项的专业实践和教育活动，并作为相关专业课程学分互认或顶替专业课程的依据，实现课程体系多层次、立体化设置，促进产教融合模式创新实施。依托地方标杆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等教学模式，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和真实的经营情境，切实保障专业教育及时吸收先进元素，确保人才培养适应岗位需求。

（四）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打通产教融合发展壁垒

1. 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要积极参与应用型高校专业群建设工作，发挥企业供应链资源整合优势，及时将行业用人标准嵌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助力高校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和明确专业技能标准，促进高校凝练学科特色。积极参与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建立行业职业标准体系，联合高校共同开展行业职业资格认定。建立行业职业资格鉴定站，促进企业专家参与“X”证书培训，实现学科教育与职业技能有效融合，助力企业人才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 鼓励企业参与联合研究

企业要加强与自身产业发展相关的应用型高校研究院（所、中心）的合作或建设工作，结合自身市场资源优势，为高校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咨询服务，确保高校有的放矢地开展创新应用研究。加强与高校联合开展研究，充分发挥高校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和实践条件，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内部培训资源和学习环境。积极参与高校科技创新与教学实践场所建设，与应用型高校共同建立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应用技术工程中心等科技创新与实践平台，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3. 鼓励企业开展社会服务

企业要发挥在实践、科研、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必要的实践创新环境，积极邀请学校教师与学生参与企业项目研发和技术改造，既有利于学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培养，又能降低企业研发经费与人才资源成本。为学校提供必要的实践师资，鼓励企业技术骨干和管理层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助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实现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目标。发挥企业在市场资源方面的优势，通过开发教育领域应用场景，为政府和高校提供必要的资源、数据资源、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实现政务资源、高校资源、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人才、知识和应用支撑。

（五）完善产教融合平台，奠定产教融合实践基础

1. 搭建产教融合服务平台

建议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联合社会力量共同设立职业技术型本科高校发展专项基金,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园、产业园、项目孵化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确保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实验实训、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得到充足保障。合理规划产业园与教育园区布局,构建“产业园+教育园”融合体,为教育链与产业链提供零距离对接平台,实现政府、高校、学生、企业(行业)之间信息实时共享。引导地方行业协会积极参与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应用型高校和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联合制定行业和专业人才需求标准,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课程标准制定,确保应用型高校有的放矢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助力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促使政校企育人主体和各类教学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2. 推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基于项目导向、团队建设,完善高校与企事业单位专家互聘机制,鼓励教师停薪留职参与企业挂职锻炼或创业,促使教师掌握最新应用技术,提升教师创新应用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创新教师聘任制度,结合专业建设需求,合理设置、降低实践类教师招聘标准,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项”聘用标准,通过全职聘任或柔性引进等方式聘请企业专家、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到校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日常教学、教材开发或科技创新等活动,促进教学与生产融为一体。建立教师队伍双向考评机制,加强校内专任教师考评,结合当前“1+X”证书制度,将教师的“X”技术技能水平纳入考核标准;创新实施校外兼职导师考评机制,加强对校外导师实践指导进行统一标准的教学监管,完善教师的岗位考核评价体系。

3. 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实践环境,通过与政府、企业联动,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高校提供场地和技术、企业提供经营服务和资金支持的方式,共同建立实验室、工程中心、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平台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样品测试等工作,切实降低科技成果进入市场后的试错风险。建立联合攻关、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科技创新共赢机制,联合开展课题申报、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丰富科技创新资源,激发科技创新潜力,实现政校企全方位、深层次融合。探索建立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成果转化模式,鼓励师生依托自身技术和高校丰富的人才、技术、设备资源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切实提升师生科技创新水平,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四、结语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办学模式迎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探索政校企协同视域下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路径和多元构建产教融合实践平台是促进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和地方大力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准确把握应用

型高校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厘清产教融合基本原理和根本目的，聚集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多方优势资源，基于政校企协同重构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实施路径，打破政校企合作壁垒，对于全面发挥政府、市场、金融、技术和人才等全要素优势资源，激发产教融合新动能，深度推进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推进应用型高校服务于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切实发挥政校企协同产教融合育人优势，也有利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取得实质性提升，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很大的帮助。

资料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总第 349 期

☆☆

高等教育系统论视域下的产教融合“组合拳”

——江苏实践与思考

祖强 许广举 魏永军

摘 要：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为遵循其内在发展逻辑，需要在制度体系上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江苏省立足省域高校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及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在高等教育系统论视域下设计出台了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产教融合重点基地、产教融合特色学院等专项计划，从特色学院建构、专业课程内涵、实践育人基地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打出了一套以产教融合为主线的政策“组合拳”，在省域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关键词：产教融合；特色学院；专业；课程；基地；高等教育系统论

一、高等教育系统论视域下的产教融合理论意蕴

1. 高等教育系统论

高等教育系统论是借鉴系统论的概念、原理和范畴，从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的角度去研究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等的科学方法论，以此指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1）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客体。要素是系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系统的要素由高等教育主体与客体构成，要素地位不同作用就不同，且在系统中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主体是教育行政管理者、高等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办学者、教师和学生；客体是知识。信息化、

“互联网+”时代，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都带来了新的挑战，管理者要尊重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简政放权、多元化办学，双师型教师要掌握数字化信息应用技能与行业企业真实问题解决能力，学生要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创新性人才。从客体知识创新的角度，高校应注重应用基础研究所取得的科学知识，探寻可能的技术路径，或者从生产实践中抽取某些科学问题进行系统认识的研究活动，并与企业共同开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项目，重视学生在行业企业真实情境中以问题驱动、任务驱动或真实案例驱动的知识学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

（2）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环境。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是高等教育联结其周围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对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目标的确定、系统功能的发挥等都与系统的环境紧密相关。产业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果转化社会未来的成效。对于复杂系统来说，其存在与环境共同的边界，会发生跨界作用、交叉融合作用，甚至相融作用。产教融合是基于双方共赢关系的深度合作，本质是跨界融合。高校与企业将各自一部分资源拿出来进行合作共用，以达到资源互补、发展共赢的目的。这里的产教融合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产业维度，另一个是高等教育维度。两个维度的融合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融合：一是双向人才培养的融合，人才培养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二是专业发展的融合，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三是科技研究创新的融合，由基于文献的学术研究转向基于行业应用的技术开发、技术迭代，转向以研究和解决应用问题为导向发展的新知识生产模式，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四是社会服务的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产业、产业发展再促进高校服务供给力的提升，共同研发技术进行技术转化推动产业升级；五是文化理念的融合，从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校企利益共同体层面形成集体文化，为培养五育并举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提供良好氛围。

2. 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理论来源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高等教育系统论又为产教融合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

3. 产教融合实践于地方普通高校的内在机理

从高等教育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分析，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促使高等教育的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使得工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彼此相对独立走向协同融合。工业革命是需要人才来进行的，所以工业革命特别是对高级人才需求大的行业，会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同

时培养出来的人才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革命的发展。当前，世界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网络化、信息化、个性化和国际化，这就要求教育要培养多样化、个性化、创新性和国际化的人才。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走在了大学的前面，需求走在了大学的前面，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做出调整来满足行业产业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产教融合不专属于职业技术学校，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同研究型大学一样要服务国家的创新发展，但它更加强调知识转化到生产实践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突出应用导向，不断向地方产业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创新性人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从理论逻辑分析，基于文献的学科体系研究的知识生产模式（象牙塔大学），由于跟踪重复，缺乏原始创新，逐渐向以问题为导向、跨界行动为特征、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知识生产、迁移和转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创业型大学）转型，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经历了从线性的“双螺旋结构”到交互式“三螺旋结构”再到非线性耦合的“四重螺旋结构”三个阶段的演变。

从实践逻辑分析，应用学科集群建设缓慢，学科、专业与课程尚未同向同行；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导致培养目标单一，教师工程能力不强，能够提供的实践教学项目不多；创新链与产业链契合度严重不足，教师适应需求能力不足。迫切需要高校转型升级，以契合产业组织系统结构优化、“四链融合”的内在需求。

二、产教融合的现实动因

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首次提出并建构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市场、大学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作用展开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者之间只有达到平衡，高等教育才能呈现良性制衡与互动发展。基于这一理论，对我国实施产教融合政策的现实动因分析如下。

1. 扶持力度不足，导致地方普通高校的发展受困

我国 1270 所本科高校中大多数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入普及化的新时期，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已经在研究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高职院校两个层面加速提升其内涵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研究型本科高校对标国际一流，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面向产业行业，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相对而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制度设计体系和财政支持体系中长期处于薄弱环节与容易忽略的中间地带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其持续健康发展。

2. 学校自身定位不清，导致高校毕业生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普遍存在对自身认识不清、认识不明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招生规模增加，学科专业设置增加，学校盲目追求大而全，蜂拥而上，申报博士点，建设研究型大学，在引进人才上不遗余力，甚至引起恶性竞争。从全国来看，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存在同质化、千校一面的现象，出现专业师资力量薄弱、人才培养质量堪忧、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大学生就业难、培养的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等问题。招生规模与产业结构不适应，专业设置与行业结构不协同，造成在就业市场上高校毕业生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3. 产业行业转型升级，对产教融合提出了迫切需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处于向数字化、智能化过渡的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产业结构迫切需要向创新驱动、服务引领和制造升级转化。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和重化工型的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人工智能、芯片等高端制造业进行转型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精尖的技术人才，一线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紧缺，高校培养人才满足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高校与产业必须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企业、行业、产业携手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展开更密切的合作。

三、突破路径：江苏产教融合制度体系“组合拳”的基本框架

为深入推进江苏“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不断提升江苏本科高校支撑、服务、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于高等教育系统论视域下产教融合理论体系，江苏省从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产教融合重点基地、产教融合特色学院等方面更好地对产教融合制度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整体推进全省高校建设，打出了一套江苏产教融合的“组合拳”，以此构建独具江苏特色、中国风格、世界水平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

1. “组合拳”一：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计划

江苏历来重视专业建设，通过持续实施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目前已建成省一流专业 384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688 个，总数位居全国第二。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有 204 个，位居全国第一。为了进一步引导江苏高校主动面向区域、面向行业、面向产业办学，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提升专业与产业契合度，完善产业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十四五”期间，江苏将遴选建设 100 个左右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有较强支撑作用的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培养大

批适合新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江苏产教融合品牌专业建设计划不仅是国家、省一流专业建设计划的继承、延续和补充，也是结合江苏高校层次结构和产业发展急需的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对象精准锚定江苏十大战略新兴产业、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50条产业强链以及其他江苏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该计划配套出台了《江苏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认定指标》，共设置了管理机制体制、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软硬件资源投入及支撑条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成效和特色项目5个一级指标（赋分占比分别为10%，42%，20%，18%，10%），13个二级指标以及34个主要指标参考点。

主要建设任务包括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机制，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高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推动学校和行业企业实现互动发展、同频共振、融合创新。创新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按照相应行业产业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发挥企业重要育人主体作用。改革高端复合型人才评价制度，强化突出以能力和素质评价为导向的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推进课程教材体系重构，校企联合构建与高端复合型人才定位相符的产教融合型课程新体系，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课程教学内容，推动知识生产模式革新。加强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校企共建集实践教学、科技研发、生产实习、培训服务等多位一体的实习实训平台，营造真实的生产和技术开发工作环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师聘任制度和评价考核办法，建立校企人力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促进企业技术骨干与专业教学骨干双向交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培养，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在素质教育、专业教育、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有效融合。

2. “组合拳”二：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建设计划

从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来看，江苏高校表现优异，共入选各类国家一流本科课程546门（含2017—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199门），从首次认定的347门“五类金课”来看，除10所部属高校和17所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高校外，其他本科高校合计仅获批42门国家级一流课程，占比仅为12%。这表明，江苏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高水平课程建设成效与其办学体量是不匹配的。2022年，江苏省教育厅启动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建设计划，从全省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中，遴选立项建设200门左右建设基础良好、产教联动深入、教学成效显著省级一流课程。该计划配套出台了《江苏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认定指标》，共设置了建设基础、教学团队、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考核评价、建设措施、特色成效8个一级指标（赋分占比分别为12%，12%，10%，30%，18%，10%，5%，3%），23个二级

指标观测点。该类课程应具有鲜明的产教融合特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将专业生产实践合理融入劳动教育目标，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明显，课程育人效果良好，能有效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课程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方法，数字化转型建设基础较好，能有效支持多方协同实施课程教学。

3. “组合拳”三：产教融合重点基地建设计划

“十三五”以来，江苏省以实验室内涵建设为主线，大力推动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努力破解实践育人的薄弱环节，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在校内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方面，以受益面大、影响面宽、基础性强的学科专业为主，建设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强化资源整合、实现提档升级、推进共建共享为导向，建设学科综合训练中心。结合国家和省“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鼓励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建设实践教育中心。在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方面，共立项建设了200个实践教育基地，其中专业实践教育基地个，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和红色实践教育基地共100个。通过建设实践教育基地，承担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促进高等教育同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高校和政府机关、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基层社区联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新机制。

在新的产业发展时代背景下，为了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企业重要育人主体作用，江苏省教育厅于2022年启动产教融合重点基地建设计划，在充分继承前期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基地采取“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校内实践教育中心”的架构模式，既体现了建设工作的延续性，又赋予了基地新的时代内涵，各高校主动适应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新要求，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合作共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持续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该计划配套出台了《江苏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重点基地认定指标》，共设置了建设基础、教学建设与改革、人才培养成效、特色项目4个一级指标（赋分占比分别为30%，40%，20%，10%），10个二级指标以及23个主要指标参考点。

4. “组合拳”四：产教融合特色学院建设计划

特色学院是一种新型的高校内部组织形态，既是落实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载体。2020年，江苏以建设省级重点产业学院作为改革的“先手棋”，两年共遴选了30个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涉及全省9个设区市，25所高校（7所“双一流”高校、8所江苏高水平大学、10所应用型本科高校），每年招收本科生7000人左右。

省重点产业学院建设得到了南京市、苏州市、盐城市等 24 个政府机关产业园区、11 个行业协会学会、103 家行业龙头企业及科研院所的支持（包括南瑞集团、康缘药业、国家电投、金风科技、中粮集团等），吸纳了 1100 多名行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建设周期内预算总经费 20.87 亿元，其中，高校自筹 7.62 亿元，企业投入 6.52 亿元，地方政府投入 6.73 亿元，有效推动了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发展，已经形成多主体参与、多元素协同、共商共管、共建共享人才培养生态共同体。同时，江苏省教育厅与江苏省工信厅共同推荐专家成立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全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30 个省级重点产业学院直接服务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等 10 个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同时，江苏省教育厅与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联合遴选认定 7 个省级重点应急管理学院，与省民政厅共建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学院，并积极谋划布局储能技术学院等新型特色学院。

2021 年教育部首批 50 家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评选中，江苏有 10 家现代产业学院成功入围，居全国第一。为呼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江苏省教育厅与上海市教委、浙江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发起成立“长三角”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联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高校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全方位开展探索，促进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高质量支撑区域产业发展。按照计划，“十四五”期间，江苏将重点遴选建设 50 个左右省级重点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应急管理学院等新型特色学院，鼓励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发展符合江苏产业定位、服务面向的各种特色二级学院，引导其深化产教融合，实现高质量多样化特色发展。

四、结语

基于高等教育系统论的视角，江苏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突破口，系统设计实施包含学院、专业、课程、基地等一揽子专项建设计划，四大产教融合专项计划既有不同的建设侧重点，又相互嵌套和支撑，并与江苏省产业教授计划、分类评价制度改革计划相配套，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政策“组合拳”，也为推动省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资料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23 年第 4 期

☆☆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

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导致部分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受伤害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一些监护人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有的甚至将实施家庭暴力混同为家庭教育方式；家庭教育服务机构良莠不齐……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这部法律将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充足、有力的法治保障。

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良好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培养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良好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等。家庭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加强亲子陪伴，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言传身教，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等。

“实现家庭教育由以家规、家训、家书为载体的传统模式，向以法治为引领和驱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模式迭代升级。”郭林茂说，这部新法将家庭教育由旧时期的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

目前，一些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对未成年人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家庭教育最关键的责任主体是家长，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因此，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郭林茂介绍说，新法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责任包括：遵循未成年人成长规律，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应当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父母分居或者离异，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依法委托他人照护未成年人，应当定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等。

在法律责任中，除了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后果外，还规定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要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郭林茂表示，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家庭，国家不过度干预，但需要一定的支持举措。新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开展家庭教育服务工作，并对家庭教育存在一定困难的家庭，特别是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服务。

新法还要求，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收养登记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应结合自身工作，提供家庭教育指导；鼓励高等院校开设家庭教育课程，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可以依法设立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新法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和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发现未成年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要及时制止管教，并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设立社区家长学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关键，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助是家庭教育取得更好成效的保障。”郭林茂说。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

家校携手 护航童年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家庭更是教育的重要场所。近年来，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通过召开家长会、组建家委会、开办家长学校、举办家长开放日等活动，积极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获得家长对学校管理和发展的认同与支持，从而达到家校携手，护航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目的。

■共筑“连心桥”

家长会是学校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方式。2月12日，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举行家长会。对于与老师当面交流，家长们充满期待。

在六年级（1）班教室，电子黑板上的PPT正展示着孩子们参加学校运动会、科技节、读书节的精彩场面，每张课桌上都摆放着学生亲手制作的姓名牌，教室后墙的黑板上集中展示了学生3年来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状。

通过大屏幕，家长们看到孩子在“跳蚤书市”分享好书时的开心一笑、体育节团体操大赛的拼搏争先、科技节上的奇思妙想……这一切都让家长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他们连连赞叹，纷纷表示：“老师这么用心对待孩子，我们要努力配合学校的工作，做好家庭教育，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搭建家校沟通平台，凝聚家校教育合力，已成为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老师和家长的共识。今年初，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在当天的家长会上，该校再次向家长们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等相关知识，帮助家长解决教育难题，引导家长依法带娃。

■育人添活力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把加强家校共建共育作为重点工作，建立家长学校，探索创新家长开放日、家庭教育大讲堂等活动，成立了校级、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目前，家委会已成为学校、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同时，该校还编写了《家校协同育人手册》，里面包括家务劳动、体育锻炼、阅读、美育以及手机管理等内容，引导家长科学陪伴孩子。

“以前觉得教育孩子就是学校的事，通过学校开办的家长学校，我明白了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今后，我将加强与学校的联系沟通，用好《家校协同育人手册》，与老师齐心协力共同教育好孩子，做到教育不错位、不缺位。”六年级（1）班学生的家长张女士感慨地说。

据了解，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成立家长学校后，通过不定期开展“家庭教育大讲坛”活动，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同时，该校还通过家访、微信、电话等形式与家长沟通，密切家校协作。

“家校协作让学校和家庭实现互通、互动。平时，学校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及时向家长答疑解惑。成立家委会后，我们又把学校重大决策和大型活动与家长商议、沟通，家校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教师马勇表示。

该校还充分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邀请家长进校开展大型活动跟班服务工作，让家长体验教师工作，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延伸了学校教育内涵，也让家校互动的模式有了新的诠释。

“过去，孩子教育出了问题，教师、家庭往往会互相抱怨。现在，许多家长在了解学校教育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校长余顺康说，“通过深挖家校共育途径，丰富共建共育活动形式，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

资料来源：《陕西日报》

☆☆

学校开展好家庭教育指导的五个着力点

鲁士发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全社会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已经从传统“家事”上升为“国事”。学校与家庭同向同行、合力育人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着力？这就需要学校从“机制、体系、师资、课程、支撑”等五个角度入手，提升学校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和水平，重视学校指导责任，强化家庭主体责任，切实解决“家校共育”的现实之忧。

关键词：家庭教育；家校共育；学校指导；着力点

2021 年 10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于 2022 年 1 月起施行。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促进家庭与学校共同教育”。新形势下，学校如何着力构建家校协同共育的教育生态至关重要。

一、“家校共育”中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

实现“家校共育”，首先要明晰家庭与学校各自的责任边界，确定其协同关系。

1. 家庭的主体责任

家庭教育是人的初始教育活动，家长担负着孩子生存、生活和生产经验传授与知识技能教育的责任。过去，很多家长教育观念存在偏差。有的把家庭教育责任划归到学校，觉得“教不严，师之惰”而忘了“养不教，父之过”。还有家长认为“老师说话比家长管用”从而产生依赖心理，将教育责任让渡给学校和教师，将学校教育功能和责任泛化，逐渐缩小甚至消失了家庭教育的功能边界，这实质是“学校主体”的错位家庭教育观。还有部分家长紧盯孩子学习甚至盲目增加课业，使孩子出现逆反心理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这实质是“重智轻德”的片面家庭教育观。这些错误观念很大程度弱化了家庭教育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发展，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发生深刻变化。家长角色从单一的教育者转变为孩子的陪伴者和共同学习者。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在于家庭，“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要“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尤其是“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有了更多闲暇时间，这也为家长进行亲子陪伴、言传身教、创设氛围、学习互动提供了条件。因此，家长要积极担当家庭教育中优秀教育者的角色，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做一个智慧型、学习型家长，建立与孩子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家庭教育样态。

2. 学校的指导责任

从教育生态系统角度来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两个单独的子系统。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附庸，学校对家庭教育负有指导和协同服务的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应当根据家长的需求，邀请有关人员传授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共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作为专业教育机构，要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专业化指导和个性化支持服务，积极督促、引导家长履行家庭教育主要责任，协同推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着力点

1. 第一个着力点是“机制”

学校要主动争取教育、文化、妇联等部门的支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机制和规范。

首先，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使教师能够从学校发展的高度来理解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义和内涵。其次，带领教师和家长群策群力制定详细、可操作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施细则，规范各方权责，建立有效的家校沟通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使家庭教育指导有章可循。再次，建立有效的家校协同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情况及相关能力建设纳入绩效管理，激发教师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积极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家委会作用，建立家长学校，召开家庭教育专题研讨会和讲座，共享家庭教育优质资源与成功经验，组织教师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家庭访问，建立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机制。

学校要设立家庭教育办公室或相应的职能部门，负责规划和制度的落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协调工作，抓好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和能力提升，协调家委会和家长学校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协同社会机构进行家庭教育合作。

2. 第二个着力点是“体系”

中小学校要构建起学校统筹、年级引领、班级实践三个层次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综合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

学校层面要立足实际，营造环境。学校应该明确管理者和组织者角色，把握学生群体特点，制订、实施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同时按照需求及时调整指导内容，精准施策、有的放矢，构建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年级层面要研究学段特点，提出方法。每一个年龄阶段所面对的家庭教育问题和困惑都有所区别，年级组应针对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特征进行指导，提出学段分类指导方法，如小学一年级针对幼小衔接方法提供指导、六年级针对升学焦虑以及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提供指导。年级组可组建家庭教育团队，上承校情、下接班情，针对特定阶段的家庭教育共性问题进行统一指导，并协助处理个别疑难问题。

班级层面要贴近家庭个体，立足实践。每一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家庭特点都有所不同，班主任要组织教师深入了解并实施个性化的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的作用，凝聚班级合力，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

3. 第三个着力点是“师资”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一致性，那么教育教学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倒塌。”这种一致性目标达成的关键在于学校的引领和指导，而

关键的关键在教师。只有切实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才能为达成共识、实现共育创造条件。

首先要建立全员参与、专兼结合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从实际发展来看，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应以本校教师为主，设置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职岗位，同时努力推动各学科教师都参与其中，再多方吸纳优秀的兼职教师。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与学生接触最多，也能直观感受其家庭教育的不当之处，因此以学校教师为主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可以在教学工作中融入家庭教育指导，及时纠正和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保证工作效率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其次要加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训。家庭教育指导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儿童心理学、生理学以及教育学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不仅自己要拥有这些知识和能力，还要科学地教会家长。因此，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要重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和评价考核，学校也要通过专家讲座、研修辅导等途径对教师进行培训，打造高水平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

再次要切实减轻教师负担，保证教师家庭教育指导专业研修。学校要进一步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保证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参加培训交流学习活动，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使得教师进行高效教育教学的同时也能够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4. 第四个着力点是“课程”

2019年5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表述，进一步调整和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要点，0~3岁儿童“重视发挥家庭各成员角色的作用”、3~6岁儿童“积极带领儿童感知家乡与祖国的美好”、6~12岁儿童“培养儿童朴素的爱国情感”、12~15岁儿童“重视价值观教育”、15~18岁儿童“加强儿童美育”等，同时也对特殊家庭、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提出了指导要求，翔实而具体。

学校要以《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为依据，按照年龄阶段由低到高，建设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以满足教师和家长家庭教育需求。现实情境中，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是衡量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学校要切实了解家长需求，聚焦并服务于家庭教育的具体实践，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建立家庭教育通识指导、拓展指导和个性化指导案例库，让家长在体验、学习、反思和行动当中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5. 第五个着力点是信息化“支撑”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可以提升“家校共育”水平。但信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家庭教育”可以构建“家校共育”的快捷渠道,提供丰富多元的数字化资源,也可能让家长在海量信息的甄别选取中浪费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可能误导家长。因此学校要加强信息平台、学习资源的建设,提供“互联网+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

首先要充分认识家校合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如今学生家长基本上是 70 后、80 后,能熟练使用网络工具,这使得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家校共育”有了基础,学校可以通过云端家长学校等途径形成“家校共育”新样态。

其次要统筹建设家庭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学校要以家庭需求为导向,组建家庭教育网络指导团队,灵活利用信息化社交平台、网络会议和直播平台等新工具,及时提供线上指导服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对家庭教育开展深度诊断和分析,并进行亲子教育测评。实现教师与家长的信息实时反馈与交流,不断提供科学化、专业化和个性化指导。

再次就是加强“一对一”家庭教育沟通,进行常态化网络家访。教师积极开展家访、全面了解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这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环节。但现实情况中教师要全部走访每一个家庭难度很大,此时可借助网络建立微信群,既与家长交流普遍的共性案例,还可以与每位家长进行“一对一”沟通,深度了解每个家庭情况,随时指导家长解决家庭教育的个性化问题。

“互联网+家庭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家校共育”的重要抓手,是数字技术赋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学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家校共育”桥梁,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注入活力。

资料来源:《人民教育》2022 年第 19 期

☆☆

“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问题、取向及优化策略

李美荟 赵慧君

摘 要: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家庭教育的积极配合和学校教育的有序开展成为新时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家校“重管轻育”、主体关系失衡以及共育能力分化等问题亟待破解。需要在生成取向、目标取向以及相互调适取向这三大价值取向的引领下,进一步践行育人初心,提升合作共育能力;不断丰富家校共育内容与形式,明

确双方的责任边界；持续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效益叠加，构建多主体共育的新格局。使家校共育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双减”；家校共育；基础教育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机制等行动措施”。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双减”既要求发挥好学校教育人主阵地的作用，又要求切实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实现家校双方的高效合作，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2021年“两会”期间教育热门话题排行榜上，“家校共育”相关话题高居第二位。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健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育人机制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国家校共育实践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剖析家校共育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探究家校共育的价值取向及优化策略，对发挥家校共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真正实现政策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一、家校共育的问题审视

随着“双减”政策、《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继出台，我国家校共育实践开始进入新时期。学生课业负担减轻，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幅增加，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减负增质”的内在要求之下，家校之间高质量的共育行动变得尤为迫切。基于此，剖析当前家校共育存在的问题，对顺利开展家校协同育人活动，真正实现政策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一）家校共育中的“重管轻育”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教育憧憬，受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家校双方长期以“管”为纽带，忽视了“育”的作用，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致使家校共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从家长方面来说，一是部分家长不断对孩子提出各种高标准和高要求，“考出高分”成为这部分家长最热切的期盼，却对孩子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置若罔闻；二是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后，满足其基本的生活起居和物质需求即可，所有的教育责任理应落在学校这一方，长此以往，极易造成孩子界限感模糊、自制力不足等问题。可见，专制型家长或放任型家长都不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唯有给予真诚的陪伴、关心和鼓励，才能全面地了解孩子的发展情况。

从教师方面来说，长久以来，学校和教师将自身的职责定格在传授学科文化知识上，缺乏对家庭教育的正确引导，也缺少和家庭之间真正的高效联动。一是“共育”的意愿水平较低，部分教师认为家长层次较低，且不具备专业知识背景，难以配合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与之进行合作还会导致自身工作量的增加；二是“共育”的理解力不足，部分教师的家校共育观念较为传统，双方的信息传递始终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为主要沟通内容。合作的方式也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家长会、学校开放日等形式，严重阻碍了家校教育合力的发挥。

（二）家校共育的主体关系失衡

学生、家庭以及学校是“双减”改革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各方关系的平衡对顺利开展合作共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家校共育过程中普遍存在家校双方主体缺位、主体越位或一方占据主导地位等“不平衡”现象。家校共育工作往往流于形式，相互推诿、缺乏实效。

一是家校的主体缺位情况。很多家长将家庭教育片面地解读为智力教育，他们将自身的家庭教育责任“推脱”给学校，让学校教师代替自己完成有关孩子的教育和管理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家教。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极为深远，家庭氛围的熏陶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此外，学校也存在教育缺位的情况，很多教师将自身的教育责任“转嫁”给家长，并以自己的教育意志对家长进行肆意指挥，由他们代替自己完成教育和管理任务，致使家长沦为教师的“助教”。

二是家校的主体越位情况。虽然家校之间的合作意识在逐步提升，但是学校长期占据教育的“中心”地位，一些教师将家长视为消极的配合者，对家长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家长只能机械地遵从，致使一些原本属于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被剥离；还有一些家长过于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忽视了教师劳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等特点，对学校教育功能进行无限放大，动辄对教师乃至学校横加指责，甚至干预教师授课、班委会的选拔以及学校各类活动安排等，造成了合作关系中的参与者地位不对等的问题。因此，厘清家校双方的责任边界十分必要。

（三）家校共育能力上的分化

与学校相比，家庭的合作共育能力相对固化。受到家庭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各个家庭的参与水平表现出分化的状态，家庭的合作共育能力常常低于学校的合作共育能力。

一是各个家庭的合作共育参与水平呈现严重的分化状态。现阶段，部分家长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家长还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被“边缘化”，他们具有严重的自我退缩倾向，缺乏合作的信心。应该看到，不同层次的家庭对子女

教育的选择和判断不仅影响当前家校共同体的建设，从长远来看，它甚至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

二是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共育能力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有调查显示，家校共育的主要障碍在于家长，53.1%的家长不知道如何合作；40.2%的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合作。相比较而言，学校的合作共育能力具备一定的制度、设备、经费、师资等保障，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外界的支持。而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固化，这也是家庭合作共育能力低于学校合作共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校协同育人的一致性。

二、家校共育的价值取向

家校共育的价值取向是指家校共育的主体尤其是家长、教师及学校在协同育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倾向。“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应该有新站位和新思路，理顺价值取向，着眼于长远目标，有利于我们的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每个人的发展。

（一）生成取向

“生成取向”指的是在教育情境中随着家校协同育人的展开而自然生成的过程、目标、结果等。它关注的并非外部事先规定的目标，而是家长、教师、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同育人的这一动态化过程。当前，很多家长甚至是学校都热衷于以分数高低权衡教育成功与否，目的是使孩子在各类选拔性考试中独占鳌头。有些教师将学生视作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将家长与学校的合作看作是家长一方的无条件服从，这些都背离了家校合作共育的初衷。

正如杜威反对把某种外在的目的强加于教育一样，家校共育行动也是不断“生长”、渐进发展的，它扎根于过去，又指向未来。当前家校共育陷入低效能的困境，主要在于家校“救急式”的合作关系，即当学生真正出现问题时才想到沟通和协作，待问题解决后，又各自为政。长此以往，极易诱发学生的消极情绪，如沮丧、抑郁、逆反等。基于此，家校共育应该保持常态化，尤其在“双减”之后，家校之间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合作共育。父母、师长的身教远远大于言传，家长、教师、学校要善于把握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教育契机，围绕提升学生多方面能力进行高效互动，帮助每个学生成长为更好的人。

（二）目标取向

“目标取向”指的是家庭、学校、教师等各方面的教育力量，按照育人目标和任务，步调一致地对学生展开协同育人行动，强调各教育主体在教育目标上达成高度的共识。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效果取决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否具有 consistency。同样，落实“双减”政策，发挥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效能，切实减轻学生不合理的学业负担，关键在于协同家长、教师以及学校的步伐，共同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想让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真挚的合作者，就亟须改变对双方地位的认知。目前，仍有部分家长认为家校共育是教师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转嫁；部分学校表现出一贯的权威感，认为家长没有能力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家校共育活动的实效性。家校本的主体关系不是相互对立或是盲目服从的，而应该具备一致的目标以及相同的行动。在家校本共育中，必须始终着眼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考虑到他们个性化发展的需要，避免功利化和形式化。唯有如此，才能跳出“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

（三）相互调适取向

所谓“相互调适”，即把家校共育视为家庭、教师及学校等教育主体同意进行修正、调整，采用最有效的方法以确保协同育人之成效的过程。它强调家校共育不是单向的传递或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双向的互动、有意义的改变。“双减”时代，我们应该以更加包容、全面的视角审视新型家校关系。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在相互调适中携手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共育模式，有效抑制“双减”过后家校新的焦虑点的生成。

尽管家校之间、各个家庭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教育能力分化的情况，但是学校与家庭这两种教育力量的结合也可以做到相得益彰。不同家长的知识经验、专业特长能够有效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的局限性，拓展教育教学资源；家长的配合和支持，能够有效减轻教师日常工作的阻力、提升职业幸福感。同样，学校和教师向家长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时，有助于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合作的意愿与信心；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致的教育目标，树立民主、和谐的家风。家校之间相互调适，为彼此注入源源不断的优化动力，能够更加多元、立体地实现育人目标。

三、“双减”背景下家校共育的优化策略

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家校本共育体现出鲜明的政策意蕴和时代特征，为家校共育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发展空间。积极探索家校共育的优化策略，有助于家校共育相关工作的统筹和规划，促进“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使教育回归育人本能，从而实现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一）践行育人初心，提升合作共育能力

“双减”实质上是教育的返璞归真，也是对当前教育内卷化的积极矫正。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学校都要在学生学业负担上多做“减法”，在育人上多做“加法”。盲目地竞争会疏远亲子关系，高压的学习氛围还会扼杀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教育并不等于管理，回归“育人”初心，“以育代管”才是孩子获得全面发展的最佳路径。

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仍然属于薄弱环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双减”之后，家长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孩子学习与成长，关注孩子的点滴进步，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树立民主的家风，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沟通；在持续深化减负共识的同时，还要做好家庭教育的“加法”，有意识地建设和维护学习型家庭，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实践能力。与学校一同营造“关怀型”的教育环境，一起为孩子搭建幸福、安心的学习和栖身之所。

另一方面，“双减”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更加关注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发展需要，主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在作业设计方面，注重减量提质，提高作业的思考性与创造性，克服千篇一律的抄写、背诵等；在课后服务方面，注重结合当地办学特色以及本校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家长要帮助孩子强化对教师、作业和其他各类学校活动的理解，将可能出现的学业压力转化为学生积极学习的动力。

（二）丰富共育形式，明确家校双方责任边界

从现实情况来看，家校之间主体关系失衡的现象比较突出，我们的家校共育行动与“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还有很大距离。“双减”政策彰显了教育格局大调整的时代要求，家校双方要各司其职、各尽其力，积极拓展合作共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牢固的家校共同体。

一是纵向引领。没有卓越的家庭教育，就没有卓越的学校教育。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与家长的沟通协作能力，主动为其提供专业化家庭教育培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各大媒体的教育资源。比如创建公众号，定期推送高质量家庭教育案例等；还可以开展家庭生活校本课程建设，在学科课程中融合家庭教育，比如在语文学习中指导小学生通过收集经典古诗词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家庭教育读书历程的研究性学习等，让学生理解品德修养对个人成长的意义；学校应该帮助家长理性确定孩子的成长预期，搭建有效的家校沟通平台，对家长面临的教育难题及时进行疏导，积极维护“双减”的减负成果，避免再次陷入教育焦虑的困境。

二是横向互助。家长委员会是家校共育的重要平台。在组建时，应该凝聚不同层次的家长，创造条件让那些能力、信心不足的家长也参与进来，更好地实现民主管理。制定与之配套的管理规范，逐步提高家长委员会的工作水平，着力解决家长面临的教育难点、痛点。比如将学生的体质、睡眠、习惯等纳入日常管理。开设“家长讲堂”，邀请具备不同学科背景、职业背景和兴趣特长的家长走上讲台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讲解。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家校共育行动，促进学生自觉、自律、主动地成长。理性地维护家庭、学校之间的责任边界，做到不越“界”、不让“界”，实现默契、高效的合作。

（三）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多主体共育新格局

《家庭教育促进法》总则部分规定：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合作共育行动提供了更多途径和可能，能够有效减少沟通的障碍、降低沟通的成本，同时能够有效克服不同主体在合作共育能力上分化的弊端。

一是整合教育资源，畅通合作育人渠道。开发校内外网络平台软件，学校可以创建网络共享资源库，上传高质量的各学科网络课程、校园文化活动素材等。还可以设置专门的家庭教育资源库，便于家长交流教育难题、分享教育心得。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为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提供适切的教育，正成为家校共育的新课题。对一些棘手的家庭教育案例，可以通过专项研究得出科学的处理方法。例如，某小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有很大比例，该校可以成立研究课题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更加科学地指导外来务工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二是注重发挥多主体共育的合力作用。随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日益多元，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设计活动主题，聘请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和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人员作为指导教师；还可以联合社区，在假期时组织学生进行家务劳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生存意识和能力。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教育事业，“双减”政策下，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融合多方的教育合力，家校共育不仅仅发生在学校和家庭中，它还是一种协调学校、家庭、政府以及社区等多方关系的培育模式。因此，家校共育还需充分整合其他社会资源，积极拓展家校共育新渠道，形成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以及公益组织、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家校共育新格局。

资料来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3月第42卷第3期